

watch|上证观察家

宏观调控效果被两股力量消解

□华民

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从2004年4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与2005年7月所采取的名义汇率升值的措施并没有能够达到预定的目标。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从内部经济状况来看,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由于缺乏微观结构的支持,成效甚微;二是从外部经济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得宏观经济政策的许多作用被外来力量所抵消了。



资欲望,问题恰好就在于他们不是所有者,而是经营管理者,且是不受约束也缺乏激励的经营管理者。这样的产权结构与企业治理结构使得作为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并不通过努力经营、为股东或者国家所有者增加可供分配的利润收入而获得好处,相反他们只有通过投资本身才能获得好处,因为只有通过不断地追加投资他们才有机会获得升迁或者获得由投资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各种租金。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何也会有强烈的投资扩张动机。因为地方政府的官员要想获得升迁或者获得较高的金钱收入,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投资,只有如此,才会有GDP的增长,才会有职位的升迁或更多的工程投资与管理的租金收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筹措投资所需的资金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国有企业来得更加容易,其中主要的有留存的税收、土地批租收益以及用公共基础设施之收费为担保的银行借贷等。

这一轮宏观调控是针对投资增长过快而做出的决定。为了回答宏观调控为何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固定资产投资会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从而通过投资本身才能获得好处,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没有产权约束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成为了投资主体。

没有产权约束的国有企业成为投资主体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它们可以不计成本和收益而进行投资,从而使得总投资超过有产权约束时的额度;第二,假如政府有关当局对信贷加以控制,它们又可以通过对投资本身获得好处的红利加以截留而用作新增投资,或许有人会问,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投

所谓投资过热,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产权约束的投资主体如一些政府部门过多地加入到市场活动中。只要这样的投资主体不从市场活动中退出,那么宏观调控的效应就必定会大打折扣。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注意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重心逐渐地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即由注重宏观调控转向注重企业竞争力的塑造。

从以上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结论呢?第一,从贸易流量增加与贸易结构的最新变动趋势来看,公司的力量在加强,而国家的作用则趋于弱化;第二,从金融资产日益国际化的发展态势来看,市场的力量在加强,国家的作用同样趋于弱化。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这两种变化与冲击,使得主权国家的政府无论是对于内的经济调控还

是对于外的国际收支调整都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约。比如,当中国政府认为国内固定投资增长速度过快,从而需要对投资规模加以控制时,外资则会因为中国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较低而前来投资,借以获取要素套利之收益,因此,除非中国关上对外开放的大门,否则,对内的宏观调控必将难以奏效。

再如,中国政府为了减少贸易顺差而实施名义汇率升值的调整措施,但是,只要汇率调整不能达到市场预期目标,那么就会形成人民币长期的升值预期,在金融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国际游资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无助于经济结构与贸易结构调整的投机活动,由此产生的后果不是外汇储备的下降或国际收支的状况趋好,反而有可能导致外汇储备

的进一步增加与更加巨大的升值压力。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发生,政府或许可以采取汇率升值的超调政策,但是,这样做又势必会造成实际经济部门因为短期内难以完成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竞争力下降的严重后果。

面对这样的两难,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在充分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将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重心逐渐地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即由注重宏观调控转向注重企业竞争力的塑造。对照一下美国,我们就会发现,美国政府对宏观调控为何会如此淡出,关键在于它拥有一大批世界级的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因为有了如此强大的微观经济基础,所以美国有能力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的中心,美国政府也因此而能够以成本最低的干预政策来实现长期的经济稳定与可持续的增长。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当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面临宏观经济政策的约束时,就应当选择有助于提高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来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对于开放度已经非常高的中国来说,这样的选择已经时不我待。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voice|上证名记者

国有资本集中不能替代竞争力

□倪小林

12月18日,国资委出台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增加国有资本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的集中度,以增加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的控制力,到2010年将培育出30至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这是我国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重要举措,对于今后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乃至相当一段时间的资本市场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任务也十分艰巨。

国有资本向重要领域集中,是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一条必由之路,此次涉及国有资本控制力调整的有三大领域,一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二是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三是其他行业和领域。国家在提升国有资本在重点领域集中度的做法上采取了分门别类,区别对待的办法,对于市场有着明确的指导和指向作用。这样的差异化产业资本结构调整,无疑给民营经济和外资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利于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也符合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原则。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单纯地提升国有资本在重点领域和产业的集中度,并非就能完成我国重点领域的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加入WTO之后,国际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尤其是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全球资本跨国界流动对我们影响更为明显,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世界环境之中。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十分尖锐。而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在本次战略调整中不加以注意,我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虽然解决了国有资本集中度,却难以达到对经济的绝对控制力的目的。

首先是国有经济的活力问题必须引起重视。改革20多年来,所有的国企改革方案几乎都是在探寻国有企业如何搞活,但正如李荣融所言,现在国有经济的比重在增加,而国有经济的活力不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不多,这关系到我国企业直接面对外国企业的竞争效果,而这决不是靠单一的国有资本集中度能够解决的。

其次,粗放型经营管理并没有在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中彻底消除。粗放型经济模式,是目前我国应对开放型经济的一个难点,以高能耗来换取高产量,以掠夺资源方式进行产品结构转型、大企业大管理粗放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了不少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必须解决的难题,如果解决不了,我国整体实力的提高必然受到影响。

再者,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在加入WTO之时,我们曾经为“狼来了”而有过忧虑,在5年后的今天全面回顾,成绩斐然答卷优秀。但是,在新的环境下解决外债问题,同样要关注内债的同等待遇问题,对某些已经过时、不合时宜的“优惠政策”应当盘点盘点,政府应该给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能够更加清醒应付外资更大并购浪潮的冲击。

央企巨额利润迎来谁的喝彩声

□林江梓

12月19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指出,中央企业主营业务的销售达到了8万亿,实现利润预计可以超过7200亿元,净资产收益率可以达到10.5%,这都是历史上最好的纪录。但是,与国资委兴高采烈的态度截然不同,面对这个红灿灿的数字,坊间发出的却是一片质疑之声,一个最常见的声音是:在这些巨额利润之后,公众的损失是多少?

从2005年的数据看,169家中央企业2005年度共获利6276.5亿元,其中来自传统的煤、电、油、运行业“十二豪门”囊括了央企总利润的78.8%。其中,中石油一家就获得1756亿元的盈利。凡是利润丰厚的央企,基本都占据着垄断地位。垄断成为这些国企获取巨额利润的保障,不然,就很难理解那些不占垄断地位的国企,何以大面积亏损。

在垄断企业获取丰厚利润的同时,公众承担了更多的成本。像电、成品油等,哪一种不是涨了又涨?油价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在国际油价上涨的时候,国内油价连续上调,从2005年3月23日到今年5月24日,国内汽油价格每桶上涨1900元,相当于每天上涨4.5元多。而在国际油价下跌的时候,国内油价却无动于衷。许多行业和公民因此付出更多成本。这些,无疑都转化成了央企的利润。

而且,目前,像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收入的5-10倍。这些成本同样被转嫁到了公众身上。公众不仅成为处于垄断地位的央企利润的来源之一,也成为其职工高收入的埋单者,这正是公众不满的根源。

因而,只有当央企在获取巨额利润之时,未向公众转嫁成本,未损失公众利益,它才能真正赢得一片喝彩之声。

“最大程度”不是没有界限

□王杰

在“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企业家年会上,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称,民营企业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给予民营企业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坚持先发展后规范,保护创业激情。

汪洋的讲话赢得在场民营企业家的热烈掌声。民营企业的发展的确需要宽容和理解,但是,这种“最大程度”的宽容也应该是有一定限度的,即不能突破法律的界限,否则,无界限的宽容有可能给民营企业造成一种错误的信号,反而容易使民企误入歧途。

比如,倘若对于一些企业违反《劳动法》拖欠工资、虐待员工的行为也以宽容,就可能使我们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再比如,倘若对一些企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也以宽容,就可能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给公众的健康带来威胁。

而且,如果对民企的宽容突破了法律限制,容易矫枉过正,构成新的不正当竞争环境。应该认识到,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诸多不公平待遇,是导致民企不够规范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民企在发展之初常不得不通过“非常手段”找寻突破口的原因。但是,随着法制

的健全,随着对民企逐渐享受国民待遇,民企的生存环境正日益改善。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强调宽容民企,也要强调规范民企,让民企清晰地感受到它的界限。事实上,民企更需要知道自己的行为界限,它才能更好地在规范中求发展。在规范中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也才更具有竞争力和活力,更具有希望和前途。

对民营企业给予“最大程度”宽容与此前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所说的反对清算民营企业“第一桶金”的说法,并不是一个概念。“不清算”针对的是过去,由于当时民营企业的地位没有从法律上得以明确,民营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对民营企业提出过高要求是不现实的。反对清算民营企业“第一桶金”,有利于已经脱颖而出民营企业继续放心发展。而“最大程度”宽容不仅包含清算,还包括了对未来民营企业创业初期“不规范”的宽容,尤其需要慎重对待。

中国的发展需要吸收全人类的成果,他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借鉴——制度与资本是国家崛起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从股改的成功到资本市场信心的恢复,似乎我们看到了崛起的基础,所以市场也就有了“黄金十年”的呼声。但中国经济毕竟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果陶醉在“黄金十年”的影子中而不面对这些问题,那么所谓的崛起将成为一厢情愿。

资本市场在经济崛起中的作用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如果从“黄

给“别墅”下定义为什么这么难

□陈子军

国土资源部、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发布实施2006年版《限制用地项目目录》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别墅、高尔夫球场、赛马场等项目用地被明令禁止。

对别墅用地供应的限制始于2003年,当年2月18日,国土资源部发布紧急通知(45号令),加强土地供应调控,停止别墅类用地的土地供应。但是,全国各大城市别墅类新楼盘依然层出不穷地推出。这一现象令许多人感到困惑。人们猜测,可能是国土资源部的禁令未能得到切实执行的缘故。然而,事实却令人大吃一惊:问题竟然出在别墅定义上。

今年4月8日,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一位副司长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采访时透露,别墅是指“独门独院的那种,占地面积又相当大,容积率非常低的那种”,目前部分城市郊区的联排、双拼别墅以及Townhouse项目,并不属于别墅,应划入高档住宅的范围。这意味着,在人们常说的五种别墅(独栋别墅、联排别墅、双拼别墅、叠拼别墅和空中别墅)中,已有多半被排除在外。

在2006年中国地交会上,国土资源部地籍司一位司长对记者给“别墅”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别墅是指独门独院、两至三层楼形式。这就意味着,除了独栋别墅,其他形式的别墅差不多都被排除在了别墅的涵盖范围之内,并因此不会被停止供应土地。而且,有人沿着这位司长的思路走下去,发现独栋别墅也不一定是别墅,假如独栋别墅不是“两至三层楼形式”而是两至四层楼或者更高,也不能说是别墅,因为这与国土资源部这位司长“独门独院、两至三层楼”的定义不符。这无疑将救活一大批别墅。

别墅类土地供应从2003年就开始停止,到2006年,相关禁令连续出台,竟然连别墅定义都没有搞清楚,又如何执行呢?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大城市的别墅楼盘一个接一个推出也就毫不奇怪了。日前,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将出台对“别墅”的准确界定,并对高档住宅和别墅用地进行不同程度的限制。但是,最终定义是什么,我们至今不得而知。

有关部门在别墅定义含糊不清的情况下,多次发出停止别墅土地供应的禁令,人们根本无所适从,更谈不上执行,而开发商从来不缺钻政策空子的悟性。这种低级错误长达近三年时间得不到纠正,也算是一个奇闻。当然,对别墅定义的模糊对有关部门是有好处的,至少不是别墅由他们自己掌握,他们自己说了算,握着这种自由裁量权,有哪个开发商敢不毕恭毕敬?别墅定义如果继续模糊下去,有可能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而它给政府公信力、土地、房价等方面带来的伤害却是难以估量的。我国房价之所以持续快速上涨,跟土地供应紧张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别墅楼盘耗费大量土地,无疑将加剧这种供应紧张的状况,进一步推动房价的上涨。这次,别墅被列入禁止用地项目,人们不禁要问:别墅定义现在弄清楚了?

去,有可能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而它给政府公信力、土地、房价等方面带来的伤害却是难以估量的。我国房价之所以持续快速上涨,跟土地供应紧张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别墅楼盘耗费大量土地,无疑将加剧这种供应紧张的状况,进一步推动房价的上涨。这次,别墅被列入禁止用地项目,人们不禁要问:别墅定义现在弄清楚了?



刘道伟制图

■“黄金十年”大讨论(9)

没有制度创新“黄金十年”将成一厢情愿

□张仕元

“黄金十年”的讨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我觉得,当我们在憧憬未来的发展时,应该多思考一些制度创新方面的问题,这也许才是我们打造“黄金十年”应该具备的认识。

中国的发展需要吸收全人类的成果,他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借鉴——制度与资本是国家崛起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从股改的成功到资本市场信心的恢复,似乎我们看到了崛起的基础,所以市场也就有了“黄金十年”的呼声。但中国经济毕竟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果陶醉在“黄金十年”的影子中而不面对这些问题,那么所谓的崛起将成为一厢情愿。

资本市场在经济崛起中的作用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如果从“黄

金十年”的角度看,目前的市场可能真的是牛市的初级阶段,但如果资本市场建设不注重制度建设,不加以规范,一炒了之,像前几年一样成为一个投机的场所,那么牛市可能就已经快见顶了。

无论什么样的市场,都是以公司的盈利增长为基础的,资本市场的功能也是基于这个基础。筹资、定价与资本配置的目的是让资金流向最具盈利前景的项目,从而给投资者以更多的回报。但在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活动中,投资者永远是处于不利地位的,没有约束的市场必然会给投机者以更多的诱惑来采取行动欺骗投资者,从而使市场再度遭受打击。

对于市场建设,笔者以为首先应该严格管理,打击欺诈行为,惩罚恶意圈钱行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是我们金融改革的方向,但不能说直接融资就可以

避免银行贷款形成的那些呆坏账。如果不严格规范,直接融资市场形成几千亿呆坏账是不可能,以往16年的证券市场融资,形成的呆坏账应该不是一个数量,否则,现在的市场早就上3000点了。

其次,要加强公司治理,形成诚信的资本市场。《大国崛起》第二集中有一个故事:巴伦支船长和17名荷兰水手看着8个同伴死去也未动别人委托给他们的货物(而这些货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甘愿忍受8个多月的漫长冬季把货物几乎完好无损地带回荷兰送到委托人手中。用生命作代价,守望信念,创造了传之后世的商法,也就成就了荷兰的辉煌。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这种精神,只有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国的上市公司能够承载投资者

的无限信任了,市场才会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礎。

第三,要培育成熟的投资者。制度是刚性的、监管的上层建筑也不是面面俱到的,如果我们的投资者不成熟,没有自我维权意识,我们的中介机构不能尽职尽责,好人不能及时“举手”,那么市场照例会现漏洞,使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失。新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已经赋予我们普通投资者许多权力,但如果我们的投资者不能熟悉并运用这些法律手段,自觉维护自身权益,那么市场依然会出现冒险者。市场就会出现虚高定价、资源配置就会出现背离。

市场的增长是以盈利增长为基础的,今年市场的持续向上应该与今年利润持续增长密切相关,今年1至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4697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30.1%,如果我们以后还能够延续这种趋势,那么市场就难言其顶。但今年利润增长受价格因素影响很大,如金属价格、原油价格等。商品价格有涨就有落,我们更希望看到上市公司通过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促使利润增加,这样才能使企业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竞争力。

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企业已经融入全球市场,利用全球的财力、人力、物力发展经济,利用全人类的先进经验建设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制度,保障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唯一不应该做的是看别人脸色。全球流动性过剩是好事,但如果如果不加以规范,可能就变成了坏事。开放的中国资本市场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就像华尔街一样,但前提是我们要有这种思想准备,有这种制度准备。